

從啓蒙走向革命

——論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初期

胡也頻與丁玲的小說創作

蘇敏逸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提 要

胡也頻（1903-1931）和丁玲（1904-1986）在二〇年代先後來到北京，1925年相識、相戀，並先後展開他們的文學生涯，而他們從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期的文學發展完全貼合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歷史道路。兩人早期的小說作品都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的發現」的思想所影響，但兩人的關注焦點並不相同，胡也頻的小說直視社會底層的黑暗，描寫軍閥、盜匪橫行下群眾生活的艱難，傳統封建思想對精神的奴役導致國民性的愚昧、麻木與落後，以及五四一代知識份子的漂泊心靈；丁玲的小說則更關注女性個人的生命困境，企圖為五四之後出走的「娜拉」在荊棘的人生道路上披斬出一條自立之路。1928年胡也頻和丁玲來到上海後，受到左翼革命思潮的洗禮，作品帶有「革命＋戀愛」的色彩，但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偏重革命與戀愛的一致，而丁玲的《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則更偏重革命與戀愛的矛盾和衝突。本論文將透過對胡也頻和丁玲小說的爬梳和分析，比較兩人「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文學道路有何異同，並由此說明兩人與

文學史的對應關係。

關鍵字：胡也頻 丁玲 五四啟蒙 革命＋戀愛

從啟蒙走向革命

——論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初期

胡也頻與丁玲的小說創作

蘇敏逸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25年五月上旬，胡也頻（1903-1931）與丁玲（1904-1986）相識於北京。在此之前二十年的生涯，胡也頻和丁玲各自走過崎嶇的人生道路。胡也頻生長在福建福州，幼年曾在私塾及小學讀書，十五歲時因父親經營的戲班解散，生活難以為繼而被送到金舖當學徒。1920年因不堪學徒生涯的種種屈辱而出逃，乘船來到上海，進入浦東中學。1921年輾轉到了天津，進入天津大沽口免費的海軍學校讀書。1923年海軍學校校舍因直奉戰爭毀於炮火，學校解散，胡也頻又流浪到北京，在北京展開貧窮慘澹的寫作、編輯生涯^❶。

相較於胡也頻一路孤獨飄零，丁玲則較為幸運地有個開明的母親一路支持她勇敢前行。丁玲在湖南桃源女子第二師範學校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剪掉了辮子。又在母親的支持下轉學到長沙著名的周南女中，受到語文教師陳啟明的啟蒙，廣泛地閱讀《新

❶ 有關胡也頻早年的經歷，參考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九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頁60-67；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頁69-76。

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增加了和封建禮教搏鬥的思想和勇氣，不久便和周南女中包括楊開慧（毛澤東夫人）等六位同學一起轉入長沙岳雲男子中學，成為湖南男女同校的創舉，接著又反抗舅父的權威，解除了包辦婚姻。此時的丁玲嚮往在廣闊的天地間追求人生的道路，因此和摯友王劍虹等人一起前往上海平民女校讀書。然而在上海尋找人生出路的過程並不順遂，丁玲和王劍虹遊蕩於南京、上海等地，也曾在瞿秋白的建議下進入上海大學讀書，但終於因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戀愛、結婚而感到寂寞，丁玲最後決定離開上海^②。

丁玲在 1924 年夏天來到北京，此時的胡也頻剛剛開始寫小說，並在這一年的十二月與項拙、荊有麟兩人一起為《京報》合編副刊《民眾文藝週刊》。胡也頻與丁玲相識、相戀後，度過一段貧窮但快樂的時光，兩人悠遊、享受著閱讀古今中外各種文學作品的生活。丁玲也在 1927 年秋天寫成了第一篇小說〈夢珂〉，正式展開她的文學生涯。丁玲早期的作品以小說為主，胡也頻則同時是個詩人和小說家。胡也頻的小說和詩歌在風格上頗有差異，他的小說展現他對社會底層苦難群眾的現實關懷，而他的詩歌則同時兼具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色彩，以瑰奇的文字和豐沛的意象聯想，謳歌真摯熱烈的情志。為了比較的方便，胡也頻的作品在此僅以小說作為討論的對象。從胡、丁兩人二〇年代中期到三〇年代初期胡也頻遇害這段時期的小說創作，可以發現兩人的創作軌跡貼合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歷史道路。本論文企圖通過對胡也頻和丁玲小說作品的爬梳和分析，比較兩人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文學道路有何異同，並由此說明兩人與文學史的對應關係。

② 有關丁玲早年的經歷，可參考她的幾篇散文自述，包括〈我的中學生活的片斷〉，《丁玲文集》第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7 月），頁 317-328；〈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262-265；〈早年生活片段〉，《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295-301；〈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302-309。

二、書寫社會底層的苦難 ——胡也頻二〇年代中期的文學作品

胡也頻在 1924 年八月初寫成了小說處女作〈雨中〉，刊登在當月十日出刊的《京報》副刊《火球旬刊》第一號上。這個短篇雖然篇幅不長，文字也相當樸拙，但卻包含了胡也頻小說中幾個重要的關懷焦點和基本精神。

小說內容描述赤貧而飢餓的趙二嫂苦苦等待著在雨中辛苦拉洋車掙錢的丈夫能帶著錢和食物回來，讓兩個挨餓但乖順的孩子能開心吃飽的心情。在飢餓而恍惚的精神狀態下，趙二嫂回想六年前土匪闖進家來，因肚子裡的小寶適時地出生，才讓她免於土匪的糟蹋欺辱。然而六年過去了，趙二嫂家清貧如故，生活依然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在這個短小的處女作裡看到胡也頻社會關懷的出發點，包括對於下層階級群眾貧窮苦難生活的描寫和人道主義的關懷，以及對於軍閥割據、盜匪橫行導致民不聊生的黑暗社會的批判。從這篇小說即可看出胡也頻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傳統精神，他的文學視窗是向廣大的、苦難的社會底層展開的。

從〈雨中〉之後，胡也頻展開他的文學創作之路，並在 1926 年底至 1929 年間進入小說創作的高峰期。除去 1929 年的《到莫斯科去》和 1930 年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兩個中長篇外，胡也頻總共發表了近七十篇的短篇小說^③，成果可謂相當豐碩。

在這些小說中可以發現胡也頻的作品依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幾類^④，第一類作品

③ 在余仁凱所編的《胡也頻選集》（上、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7 月）中收錄胡也頻近五十篇的短篇小說，但對照書末所附、丁景唐與瞿光熙所編的〈胡也頻著作篇目〉，胡也頻的短篇小說應有近七十篇。

④ 余仁凱在〈「文藝的花是帶血的」——論胡也頻的創作道路〉一文中對胡也頻小說的內容進行分類時，認為胡也頻的小說「為舊中國的畸形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這寫照包括四個方面：「反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殘酷的剝削和血腥的鎮壓的」、「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對於人們思想的毒害的」、「揭露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國民性』的墮落的」、「從病態人物的變態心

直視社會底層的黑暗，描寫軍閥、盜匪橫行下群眾生活的艱難以及階級差異對下層階級的壓迫，同時也展現作家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在這一類的作品中，胡也頻首先著重的是下層階級貧窮的處境，除了〈雨中〉外，還包括〈一個窮人〉、〈小人兒〉、〈海那邊〉、〈毀滅〉等作品。〈一個窮人〉描寫主人公伯濤在飢餓狀態下對自身貧窮的處境憤恨不平的情緒，爲了換一口飯吃，他不惜以畫片騙取小女孩的雞蛋糕，甚至幻想自己成爲掠奪闊人財產的強盜，最後因付不出積欠了三個月的房租而逃跑，只留給同樣窮困飢餓的房東老太太幾本破書。〈小人兒〉描寫遺腹子「小人兒」長期遭受暴躁怨恨的母親身心上的虐待，只能在趕羊到牧場上時，才能感受到生命中少有的自由與快樂，而她的母親則在長期困窘的生活下沈溺在咒命、怨窮的情緒中。

〈海那邊〉描寫臨海葛沽的窮人在凜冽的北風哮喘下悲苦的命運，大風不僅吹走了賴以維生的漁網和魚獲，更讓窮人凍死在黑暗的荒野中。〈毀滅〉則描寫五十多歲貧窮的木匠因養不起孩子，所以不得不再殺死自己的親骨肉。回想過去的生命是「一個萬分窮困和苦楚的艱難的路」，在困乏與痛苦中，木匠憤怒的情緒油然而生：「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很好的活著，獨獨他和他的妻是早就該死的！」^⑤。這些小說不僅僅描寫貧窮的悲苦，也由貧窮生發出憤怒的情緒，這情緒既能發展成反抗社會壓迫的力量，也是未來胡也頻能點燃革命熱情的火種。

從描寫「貧窮」的主題出發，胡也頻也在下層階級的困窘中提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例如〈珍珠耳墜子〉呈現最質樸的階級意識，小說描寫富紳王品齋第三個姨太太失落了一只珍珠耳墜子，爲了避免引起「重視物質」的老爺的責罵，便誣賴給服侍老爺吸煙喝茶的啞巴孤兒小唐，而家中的老媽子爲了自保，也附和姨太太，直指小唐偷盜。老爺在盛怒之下打了小唐五十個皮鞭，又將他在夜裡逐出門外，姨太太卻於此時在自己的枕頭下發現了失落的耳墜子，這是昨晚在瘋狂的歡愉中無意間落下的。小說中的老爺和姨太太自私而冷酷，視人命如糞土，而對於無法爲自己辯駁的啞巴小唐，

理去寫出社會的畸形的」。《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39-44。本人的分類則在余仁凱的基礎上略作修改。

⑤ 胡也頻：〈毀滅〉，《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535。

胡也頻則寄予無限同情。延續著對「有錢階級」的批判，〈那個大學生〉描寫一個官僚模樣的大學生終日打麻將、追逐女人，過著無所事事、虛榮浮誇的鬼混生活；〈子敏先生的功課〉描寫時髦人物的虛偽與醜惡，子敏先生每天的「功課」便是給太太寫一封充滿情意的信，然而他的靈魂卻早已陷落在「月宮跳舞場」舞女的身上；〈便宜貨〉則尖銳地批判「寧肯在一副麻將牌上盡輸，卻不能只和一個女人在床上盡睡」^⑥的軍需長不斷地用低價買女人的惡劣形跡。此外，〈一個村子〉和〈四星期〉則取材自二〇年代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歷史事件，包括軍閥的混戰與割據以及北伐革命的失敗，因而具有更廣闊的社會視野。其中〈一個村子〉描寫村落滿心期待三代以來難得的豐年可以帶來歡樂與幸福，卻沒料到軍閥陷落了縣城，給金黃色的田野帶來血腥而殘酷的屠殺；〈四星期〉則描寫國民革命軍北伐革命的過程，以及革命陣營內部分裂後到處捕殺共產黨員的肅殺氣氛。

這些作品反映了胡也頻的社會關懷，他從下層階級備受壓迫的悲苦生活中逐步發展出他的階級意識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觀察。他在創作初始便展現了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這與胡也頻的個性以及他早年的經歷有關。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曾提到胡也頻的性格：

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敢、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人」，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⑦

正是這「勇敢、熱烈、執拗」，這「最完美的品質」讓他對人的生命有無窮的愛與同情，對社會的黑暗與不平有反抗的勇氣和戰鬥到底的頑強鬥志，因此他在小說中對社會問題投注源源不絕的關懷，也讓他最終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天生的秉性，胡也頻早年飽受羞辱的學徒生涯與日後流浪漂泊的貧窮歲月也讓他深深體會下層階級的艱辛

⑥ 胡也頻：〈便宜貨〉，《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546。

⑦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九卷，頁 66。

與痛苦，而他少年學徒時代從金鋪叛逃的經驗更顯示他面對社會的壓迫和屈辱時，並非認命地承受，而是懷抱著深沈的憤怒。

胡也頻第二類的作品集中批判傳統封建思想對精神的束縛和奴役，導致國民性的愚昧、麻木與落後。這是五四新文學時期由魯迅所展開的重要議題。胡也頻這類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反封建」的作品，包括〈酒癲〉、〈雪白的鸚鵡〉、〈生命〉、〈兩個婦人〉、〈他和他的家〉、〈黑骨頭〉（原題名〈浪花〉）^⑧等。其中〈酒癲〉描寫傳統文人被新時代淘汰後的失意和苦悶，長期壓抑的心理在酒後爆發為大家長式充滿權威、兇暴而狂亂的命令和怒斥。〈生命〉和〈兩個婦人〉兩篇小說著重在傳統女性卑微的處境，〈生命〉中的年輕女性在痛苦的生產過程中忽然清醒地領悟到自己作為女性一生悲哀的命運，她被有錢的老頭子買來，成為性欲的玩偶，卻獨自承受著生產的苦刑。小說描寫女人在生產後痛苦而虛脫的精神狀態下出現了迷離的夢境，這夢境揭示了傳統封建社會帶給女性的只有傷痕和死亡。最後她對現實最卑微的反抗也只能是將自己和孩子一起殺死。〈兩個婦人〉中兩個舊式婦女自幼裹小腳，讀女孝經和朱子治家格言，被教導成傳統賢淑的女性，她們嫁為人婦後，鼓勵丈夫去讀書上大學，然而丈夫一接受新式教育，便鄙夷嫌棄妻子的落伍而拋棄她們。〈他和他的家〉描寫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與封建家庭的隔膜；原名〈浪花〉的〈黑骨頭〉描寫青春男女因家庭階級地位的懸殊導致愛情的悲劇；〈雪白的鸚鵡〉則暗喻封建力量對生命能力的斷傷。

從「反封建」的議題向外延伸，胡也頻也觸及到對於「國民性」的反省和思考，這類作品包括〈械鬥〉、〈聖徒〉、〈活珠子〉、〈小小的旅途〉、〈傻子〉、〈土地廟〉、〈船上〉等。早在1925年初，胡也頻就寫過雜論〈雷峰塔倒掉的原因〉^⑨批評中國鄉民因為相信雷峰塔的磚放在家裡能保平安，使你一塊我一塊地偷偷挖著磚，

⑧ 此篇〈黑骨頭〉原題名〈浪花〉。胡也頻另一篇描寫工人運動的小說也題名〈黑骨頭〉，刊於《現代學生》第一卷第二期，但一刊出即遭到國民政府的注意，因此該刊再版時，標題仍為「黑骨頭」，卻將內容以〈浪花〉這篇小說來取代。《胡也頻選集》（上冊），頁627。

⑨ 胡也頻：〈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胡也頻選集》（下冊），頁1049-1050。

由此看出中國人的愚昧和迷信；在〈無聊的通信（一）〉^⑩則從作為商埠的山東煙台的年輕女孩尚且纏足的現實，發現傳統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新文化思想傳播上的困境和瓶頸，更由此批判中國國民性中的「善忍」：

我們只希望青年人不要抱著「『忍』是天高地闊」的見地，一直的『忍』下去，甚至無端的被人家打了兩個嘴巴也忍而不作一聲！

然而，現在的青年卻的確是會「忍」，無論感觸了什麼事情都是「忍」而不言；縱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也是以「忍」為尚！^⑪

而在善忍的背後，不正是怯懦與麻木的國民性嗎？

小說〈械鬥〉中呈現的是農村的封閉、落後和愚昧，以同仇敵愾的情緒、集體械鬥的流血衝突方式去解決兩個村子的恩怨，終而導致兩個村子的重大死傷；〈活珠子〉中的群眾相信道士所言，認為扁頭王大保的腦中有顆活珠子可以長保富貴，死後成仙，便一心覬覦著王大保的腦袋，小說呈現村民的窮困、迷信、殘忍與麻木。同樣描寫群眾冷漠麻木的還有〈傻子〉，小二善良勤快、熱心助人，卻被全村自私的群眾視為「傻子」，他因無意間目睹凶殺案而遭滅口，但全村的人卻對他的死亡冷淡地漠視，只在需要有人耐心耐煩地賣力氣時才想起他。〈土地廟〉描寫破舊的土地廟已淪為群眾無所事事，群居終日地鬥蟋蟀賭博的地點，而地保則從中獲取暴利。〈小小的旅途〉則透過一次小小的旅途，描寫群眾擠在黑暗、骯髒、惡臭、密不通風的船艙裡卻仍然甘之如飴的情形，來暗喻黑暗的中國，以及中國人對於如同畜生般「非人」的生活狀態的麻木無覺，小說敘述主人公站在小火輪上看著混亂地進行著買賣的女販子和男客人，「使人不困難的聯想到中國式廁所裡面的糞蛆，那樣的騷動，蜷伏，盤來旋去」，而到船艙裡又得面對「正在黑暗中閒談和靜躺著的那些怕風者」，他們「不就是和糞蛆

⑩ 胡也頻：〈無聊的通信（一）〉，《胡也頻選集》（下冊），頁1054-1057。

⑪ 胡也頻：〈無聊的通信（一）〉，頁1056。

同樣討厭的一堆生物麼」？¹²同樣以輪船作為小說背景的〈船上〉則描寫中國人怯懦又勢利的奴隸性。

胡也頻從關懷下層階級貧窮的生存困境出發，進而思考軍閥割據和階級差異等社會問題，又從群眾的生命狀態出發，挖掘中國人愚昧、麻木又怯懦的奴隸性。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到胡也頻投向社會底層的文學視野，並展現強烈的社會關懷與人道主義精神。然而，他還有一系列的作品投向自我個人，這第三類作品以個人經歷為素材，描寫五四一代知識份子貧窮漂泊的處境，這類作品包括了〈無題〉、〈漂泊的記錄〉、〈楊修〉、〈詩稿〉、〈北風裡〉、〈往何處去〉、〈一群朋友〉、〈美的戲劇〉、〈黎蒂〉、〈夜〉等。

黃昌勇在〈文學人生：左聯五烈士綜論〉一文中以瞿秋白曾提到的「薄海民（Bohemian）」¹³的概念來說明胡也頻和柔石的生命狀態，頗為精準地把握兩人的生命經驗和精神面貌¹⁴。胡也頻在處女作〈雨中〉之後連續寫作〈無題〉、〈漂泊的記錄〉、〈楊修〉等三篇描寫知識份子貧窮漂泊，無以維生又找不到人生出路，因而失意苦悶，甚而自殺的小說，這些作品可以說完全寫出了胡也頻在北京流浪時的生活窘境，同時也可以發現胡也頻在創作之初，雖然也關注社會問題，但也許更強大的創作動力來自於精神的苦悶需要抒發。

在這些書寫知識份子的作品中，〈楊修〉和〈黎蒂〉分別表現了男性和女性知識份子的生命困境。〈楊修〉中盡是對人生感到消沈頹喪的知識青年。楊修對於繪畫的前途感到渺茫，失戀的痛苦又讓他對生命感到絕望，最後他決定到廣州去「革自己的

¹² 胡也頻：〈小小的旅途〉，《胡也頻選集》（上冊），頁443。

¹³ 「薄海民（Bohemian）」意指放蕩不羈的人，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曾提到：「『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裡迅速的積聚著各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瞿秋白同情這些流浪的知識份子，是封建制度瓦解後，在帝國主義、官僚軍閥和資本主義擠壓下的孤兒，但也批評這些小資產階級虛無、頹廢、浪漫、歇斯底里的世紀末氣質。《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13-114。

¹⁴ 黃昌勇：〈文學人生：左聯五烈士綜論〉，《磚瓦的碎影》（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頁38。

命」。這篇小說寫在 1926 年十月底，正是北伐革命在南方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廣州」對楊修這類漂泊徬徨的知識青年而言代表著混沌的人生處境中透著微光的一條出路。然而這些知識青年真正關心的並非是社會或革命，他們固然也對社會現實感到憤恨和不滿，但他們對於革命並沒有充分的認識和堅定的信仰，他們只是想在此找到一條可能的人生道路。他所說的「革自己的命」既有擺脫自己消沈意志的願望，但也許更多的情緒是如丁玲筆下的莎菲頹廢而虛無的自我放逐：「悄悄的活下來，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¹⁵比〈楊修〉更能與丁玲筆下的「莎菲」合觀的是描寫女性知識份子處境的〈黎蒂〉，沒有資料證明胡也頻寫作這篇小說是否受到丁玲的影響，但兩個女性的氣質與靈魂是相似的：兩人都是客居北京的漂泊者，她們都對北京沈悶窒息的空氣感到無聊和厭煩，她們都看不到女性在社會中獨立的道路，她們甚至都沒有真正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小說描述黎蒂「沒有真切的了解過她自己」，「她只是沈淪在破滅的希望和無名的悲哀裡面，但又不絕地做夢，不停地漂泊，痛惜而終於浪費她的青春和生命……」¹⁶。當大家討論到中國現代婦女的處境時，黎蒂認為：「現在可說是沒有一個女子曾獨立過！」¹⁷小說最後黎蒂也像「莎菲」一樣決定離開北京「消磨我的未滿的歲月」。不論是楊修或黎蒂，都可以看到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擺脫傳統束縛之後來到社會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五四退潮後既找不到精神上的追求，又找不到現實中的經濟來源時進退失據的徬徨與苦悶。

此外，〈往何處去〉和〈夜〉特別著重在描寫年輕創作者的窮困潦倒，〈美的戲劇〉則是年輕創作者所幻想的成功美夢。〈往何處去〉中的無異君在艱辛的創作道路上跋涉，然而書店經理卻在恭維中暗示他寫些關於戀愛和性欲題材的能賣錢的作品。新的作品無處出版，舊的作品也因滯銷而拿不到版稅，從北京流浪到上海尋找人生出路的無異君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命運就是「從辛苦中出來，又得向辛苦中走去」¹⁸。

¹⁵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78。

¹⁶ 胡也頻：〈黎蒂〉，《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571。

¹⁷ 胡也頻：〈黎蒂〉，《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572。

¹⁸ 胡也頻：〈往何處去〉，《胡也頻選集》（上冊），頁 459。

〈夜〉中的一川則獨力苦撐著文學刊物的發行，每天辛苦地看稿、選稿，但可用的作品卻非常有限，爲了不讓慘澹經營的雜誌停刊，一川只能自己不斷地熬夜寫作，但所有現實的煩惱卻將他的創作興趣毀滅殆盡。這兩篇小說頗能看到胡也頻在二〇年代創作與發行雜誌時的艱難歲月，同時也正是自身貧窮困難又漂泊的經歷，讓他的文學視野投向廣大的下層階級，讓他對社會底層的苦難感同身受，進而獲取豐富的創作題材。

在書寫流浪的知識份子在異鄉孤獨窮困的處境同時，胡也頻也寫作少數幾篇懷念童年故鄉的作品，包括〈中秋節〉和〈登高〉等，其中〈登高〉回憶故鄉福建閩侯縣每年在九月九日登高放紙鳶的習俗、陳表伯帶「我」和鏘弟去放紙鳶的快樂時光以及節日過後父親要「我們」燒掉紙鳶時的落寞和失望，這篇文章讓人聯想到魯迅的〈社戲〉¹⁹以及《朝花夕拾》中的〈五猖會〉等篇章²⁰，作品在溫暖的筆觸中呈現故鄉濃厚而獨特的風俗民情，卻又流露著對於童年和故鄉的深深懷念，以及對於快樂童年已經永遠逝去的無限喟嘆。〈中秋節〉則懷念童年時中秋節全家團聚的熱鬧以及「我」與蒂表妹青梅竹馬的感情。與胡也頻書寫社會貧窮苦難、批判國民性的愚昧麻木以及描寫知識份子苦悶消沈的心靈狀態等三類作品相比，這些懷舊篇章是胡也頻少數幾篇較為溫暖美好的作品，是艱辛的人生道路上微薄的慰安。

1928年胡也頻和丁玲來到上海，在上海這個資訊相對發達與開放的大城市，胡也頻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禮，思想迅速左傾，這個轉變，也表現在胡也頻的短篇小說裡。發表於1928年九月的〈墳〉中，首次出現了革命者的形象。〈墳〉描寫四個負責掩埋革命者屍體的工人受到革命者的精神感召而覺醒、犧牲，然而中國的革命者卻永遠是孤獨的，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後又被人遺忘，當「新時代」來臨時，善忘的中國人便在早已長滿荊棘的革命者的墳上巍然地建起富麗堂皇的咖啡廳和跳舞場。這篇小說的意涵是相當鮮明而豐富的，從革命者孤獨的處境批判中國人的麻木和冷漠，然而四個工人的義憤與覺醒又讓人感到革命的希望與力量。此外，這篇小說的主題顯然受到魯

¹⁹ 魯迅：〈社戲〉，收於《吶喊》，《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559-570。

²⁰ 魯迅：〈五猖會〉，收於《朝花夕拾》，《魯迅全集》第二卷，頁261-266。

迅的小說〈藥〉²¹的影響，〈墳〉中「烏鴉」的形象也與〈藥〉中的「烏鴉」相互呼應。

〈墳〉之後，胡也頻在 1929 年到 1930 年分別寫作了〈四星期〉和〈黑骨頭〉。〈四星期〉描寫國民革命軍北伐從混沌不明、混亂騷動到逐漸恢復秩序的過程，然而就在一切將上軌道之時，革命陣營內部忽然分裂，隨之而來的是搜捕共產黨的恐怖和肅殺。〈黑骨頭〉則描寫長期被外國紗廠老闆剝削和壓迫的黑骨頭工人「阿土」覺醒到犧牲的過程。他曾經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看到工人解放的契機，然而隨著國民黨「清黨」的展開，阿土也走上工人革命的行列。小說最後雖然阿土犧牲了，但工人的覺醒也讓革命運動出現了光明的前景。〈四星期〉和〈黑骨頭〉這兩篇小說雖然有主題和意旨過於鮮明簡單以及意識形態先行等問題，但卻可以看到胡也頻從早年較為單純的社會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出發，逐漸形成對時代歷史和社會問題較為具體清晰的看法，也代表胡也頻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歷程。

1927 年至 1928 年間，胡也頻和丁玲、沈從文等三位在北京展開創作生涯的文學同志先後來到上海，並計畫自籌經費創辦刊物，1929 年 1 月 10 日，三人夢想已久的刊物《紅黑》正式出刊。胡也頻在 1929 年三月《紅黑》月刊第三期中曾在「卷首」寫過如下的文字：

如同凶猛的海水擊著礁石，強硬地，堅實地生出回響的聲音，這是人間苦的全人性活動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藝產生的動力。

為一個可悲的命運，為一種不幸的生存，為一點渺小的願望而奮力爭鬥，這是文藝的真意義。

負擔著，而且深吻著苦味生活的人，才能夠勝任這文藝的使命。

地球上沒有黃金是鐵色的，所以要經歷一個黯淡人生，才充分地表現這人生的可悲事實。

²¹ 魯迅：〈藥〉，收於《吶喊》，《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440-449。

文藝的產生是因為缺陷的，並且為這缺陷的人類而存在著。

要創作，必須深入地知道人間苦，從這苦味生活中訓練創作的力。

文藝的花是帶血的。²²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到胡也頻對於文藝的態度，便是直視人生的缺陷和苦難，這樣的態度讓人聯想到魯迅在〈一覺〉中曾提到他閱讀青年作者的文稿，感到青年的靈魂「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於是他說：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雲鬱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²³

在中國這樣的亂世，苦惱、呻吟、憤怒而粗暴的文學作品即使讓人感到痛苦、不安，無論如何也要比不食人間煙火的作品來得真實深刻。這是魯迅直面人生的態度，也是胡也頻的態度。同時，胡也頻面對人生苦難的態度不是認命地承受和忍耐，而是奮起與搏鬥。因此他二〇年代中期的小說創作絕不迴避他所能見的，社會中的任何問題和苦難，即使他的小說創作在刻劃現實苦難時顯得直率、樸拙，缺乏他的詩歌中所富有的瑰奇的文采和豐沛的想像，也缺乏較細緻、完美的藝術成就，但卻在樸拙中透顯著深沈的力量。

²² 胡也頻：〈卷首題辭〉，《胡也頻選集》（下冊），頁 1078。

²³ 魯迅：〈一覺〉，收於《野草》，《魯迅全集》第二卷，頁 223-224。

三、追尋女性個人的生命意義和出路 ——丁玲創作初期的文學作品

丁玲在北京開啓她的創作生涯，她的處女作〈夢珂〉寫成於 1927 年秋天，同年冬天發表於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丁玲曾自述她開始寫作的契機來自於北伐革命失敗後肅殺的社會氣氛，她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曾提到當時的心情：

我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我的苦痛，和非常想衝破舊的狹小圈子的心情，也影響了也頻。²⁴

這篇文章是 1950 年的追述，丁玲在這篇紀念胡也頻的文章中，也有意無意地重新敘述她幾十年來思想的成長和轉變，並將她個人的創作起點與革命的大敘述相互結合。然而回顧二〇年代中、末期，丁玲當時的思想其實是相當複雜的，既對封建舊社會不滿，具有相當鮮明的「個性解放」的精神，又夾雜著小資產階級虛無頹廢的情緒和無政府主義空洞的理想性。因此，北伐革命失敗也許是點燃丁玲創作欲望的火種，因為革命失敗後社會上普遍瀰漫著頹廢消沈的氣氛正與丁玲當時找不到人生出路的苦悶情緒合拍；然而真正讓丁玲燒起創作欲望的熊熊火焰，並且源源不絕地創作下去的動力，卻

²⁴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九卷，頁 67。

並非來自於「革命」，而是來自於丁玲自身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生存困境。

如同胡也頻的小說處女作〈雨中〉包含了胡也頻小說的關懷焦點和基本精神，丁玲的小說處女作〈夢珂〉也包含了她創作初期對於女性生命困境的基本思考。小說主人公夢珂輾轉在學校、好友勻珍家、姑母家等地方安頓生活，最後因難以忍受姑母家虛偽的親友和虛假的愛情而離家出走，決定到圓月劇社應徵演員，設法自立更生。然而導演在面試時卻要求她勒去兩鬢和額上的短髮，顯出那圓圓的額頭和兩個小小玲瓏的耳垂讓他審視。進入劇社後，所有人又當著她的面前評論她的容貌，像商議生意一樣，她感到自己像妓女一樣被毫不尊重的眼光所觀覽，卻也只能任由化妝師將她的臉畫成和「四馬路的野雞」一樣。爲了工作，她沒有反抗。漸漸地，她的隱忍力愈加強大，能讓她忍受非常無禮的侮辱，她就這樣成爲上海當紅的女明星²⁵。〈夢珂〉提出了丁玲早期小說兩個重要的議題，一是透過夢珂漂泊而坎坷的經歷，展演了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新式女性知識份子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困境；二是從夢珂進入劇社後所遭受的眼光來凸顯女性處境與社會現代化、資本主義商品化之間的問題。

在〈夢珂〉之後，丁玲於 1928 年春天發表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之後一、兩年內陸續寫成了〈暑假中〉、〈阿毛姑娘〉、〈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自殺日記〉、〈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以上均作於 1928 年）、〈過年〉、〈歲暮〉、〈小火輪上〉、〈他走後〉、〈日〉（以上均作於 1929 年上半年）等作品。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作品主題也承接〈夢珂〉而來，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圍繞著新式女性知識份子在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困境與苦惱，特別集中在「愛情」和「工作」兩者不順遂的主題上。〈莎菲女士的日記〉、〈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等作品較偏重在戀愛的主題，坦率地描寫女性作爲一個有知覺有感情的「人」在面對戀愛時種種曲折複雜的心情；而〈暑假中〉、〈小火輪上〉等作品則更著重在女性工作中的挫折，包括對社會現實的難以適應、理想難以實現、工作無聊，想要改

²⁵ 丁玲：〈夢珂〉，《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33-40。

變現狀，卻又害怕改變，也無力改變等問題；其餘的小說也許並不呈現具體的問題，但卻在主人公無所事事、無聊寂寞的生活和心緒中，突顯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生命困境，如〈自殺日記〉、〈日〉等。另一類探討女性處境與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作品，則以〈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為代表。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相較於胡也頻有大量的作品描寫社會底層的苦難，丁玲的作品則更聚焦於個人自身的問題。如果說胡也頻的社會關懷與人道主義精神更接近於「文學研究會」的系統，那麼丁玲對於自我生命困境的坦率抒發，則更接近於「創造社」的系統。

〈夢珂〉之後，在表現女性知識份子生命困境的議題上，〈莎菲女士的日記〉可算是其中最著名也最出色的代表作。「莎菲」這個名字也如五四時期的「娜拉」一樣，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內涵和意義的代名詞。這篇小說的主題看似圍繞在莎菲的戀愛經歷上，實則丁玲想要透過莎菲呈現五四退潮之後，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人生困境和社會處境，以及她們面對愛情、欲望與追尋人生意義和目標時種種複雜曲折的困惑和矛盾。整部小說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份在於描寫莎菲面對「愛情」時複雜的心情²⁶，丁玲大膽而坦白地寫出女性在面對異性和感情時非常複雜隱微又矛盾的心情。圍繞在莎菲身邊的男性有葦弟和凌吉士，葦弟對莎菲很好，但凌吉士才是真正吸引莎菲的異性。莎菲周旋在兩位男性間，精神與肉體、理智與情欲產生種種衝突和拉扯，有時期待安穩，有時又渴望刺激，使她的態度忽冷忽熱，表裡不一。例如在小說一開頭，十月二十四日後半段的日記中即描寫葦弟前來探訪病中的莎菲，莎菲面對葦弟時忽遠忽近，瞬間轉變的流動心曲，她既期待得到葦弟的關愛，又為葦弟的順從感到缺乏戀愛的刺激感和挑戰性，同時也認為葦弟無法真正了解自己而感到精神上的隔膜。後來因好友雲霖的關係而認識了新加坡華僑凌吉士，凌吉士美好的外貌使莎菲心動，在一月四日的日記中，莎菲坦率地直言她急著搬家，就是為了製造和凌吉士見面的機

²⁶ 藍棣之認為〈莎菲女士的日記〉小說的核心，「是在抒訴女主角內心深處靈與肉的衝突，情欲與思想的衝突，以及最後靈怎樣戰勝肉，尊嚴怎樣戰勝欲望，真實怎樣戰勝虛假。」藍棣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頁117。

會。在之後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她爲了吸引凌吉士的注意，欲擒故縱。在戀愛中，莎菲是有心機的，是虛榮的，也是任性的。隨後她發現凌吉士並不如他的外貌那麼美好，他不但靈魂庸俗，還是個會去韓家潭玩樂的花花公子，但莎菲的情感抗拒不了凌吉士的外貌，她的理智無法說服她的情感，讓她離開凌吉士。三月二十七日晚的日記，她描寫苦苦等待凌吉士來看她時難熬的心情，生動地寫出每個戀愛中的人都會體會過的感受。最後，三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的日記，她詳細地紀錄面對靈魂和肉體的抉擇，她的理智和情感如何激烈地搏鬥著，但她終究無法抗拒凌吉士的吸引，想要得到他的吻。然而當凌吉士真的吻了她後，她的理智又忽然清醒，她深深痛悔，痛悔自己的墮落。小說中這種種心情的描寫，都細膩地表現出女性在面對感情時幽微而複雜，甚至是善變的真實心理。

除了愛情這個主題，從日記的瑣碎記錄中還可以看到莎菲在愛情之外的人生問題，她的外在生活和內在心理都遭遇重大的困境，而外在、內在的困境又糾結在一起，互相影響²⁷。就外在生活來說，她患有嚴重的肺病，加上她一個人離開家庭，獨自在寒冷的北方度過新年，孤獨感更加強烈。因病無法工作和讀書，也讓她的生活益發無聊。小說開篇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看似瑣碎，卻非常生動而細緻地呈現她無聊苦悶、無所事事的生活的基本樣態：她把牛奶反覆煨了三次，又把報紙從頭到尾詳細地看了一遍，連廣告都沒放過，甚至連今天的廣告和昨天有何差異也完全知道，都顯示她長期處在生活無聊的狀態，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她的心情非常煩悶，怨氣衝天，房客、夥計、飯菜、窗戶、鏡子、四周的一切沒有一樣是看得順眼的。肺病、強烈的孤獨感加上過度空閒無所事事的生活，使得莎菲產生極嚴重的自憐心態，她覺得自己很可憐，因此希望從外在得到許多的愛和友誼來滿足她空虛的生活，她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關

²⁷ 張永泉在〈在黑暗中尋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評價〉、〈莎菲生活時代背景考辨〉、〈莎菲——執著的理想主義者〉、〈再談莎菲——兼與箭鳴先生商榷〉等論文中曾完整而詳細地分析莎菲的形象、精神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並區別莎菲與「以自我為中心的純粹的個人主義」和「愛情至上主義」的差異。因此〈莎菲女士的日記〉雖然細緻地描寫女性在戀愛過程中複雜的情緒，但「愛情」卻並非這篇小說的唯一主題。四文均收於張永泉：《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3月），頁3-84。

注她、了解她。就內在心理來說，她的心理可以用「無法滿足」來蓋括。因為「無法滿足」，所以她總是渴望很多的愛，覺得身邊沒有任何朋友能「真正地」「完全地」了解她。人與人之間原本就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了解，而莎菲卻以這個過高的要求來對待她的朋友們。莎菲身邊並不是沒有細心關照她的朋友，毓芳、雲霖、金夏和周，以及熱愛著她的葦弟都相當愛護她，但莎菲仍不滿足，她覺得全世界只有蘊姐了解她，然而蘊姐已經過世了。假設蘊姐還在世，「永遠無法滿足」的莎菲又真的會視她為知己嗎？也是由於「無法滿足」，所以她的有許多反覆無常的行為，特別表現在愛情上，在對待葦弟和凌吉士的態度上，得不到時想征服他、掌控他，得到時又嫌棄自己所得到的竟是如此平庸乏味的東西，悔恨自己的墮落。然而她反覆無常、無法滿足的心理狀態，也許病根正源自於她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句話：「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²⁹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要什麼，所以她的心永遠無法安定，始終反覆搖擺，又像個黑洞，永遠也裝不滿。

〈莎菲女士的日記〉具體描寫的是莎菲因愛情產生矛盾而病態的心理，類似的描寫在〈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與〈他走後〉等小說中也反覆出現。〈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描寫知識份子的頹廢和虛無，男主人公鷗外鷗以嫖妓、墮落的方式報復失意的人生，女主人公薇底雖是有夫之婦，卻仍在愛情遊戲中虛擲生命的情熱，小說如同〈莎菲〉一般不重在情節的鋪排，而重在情緒的渲染。〈他走後〉則描寫女主人公麗姍在情人秀冬走後，回想自己周旋在幾個男人之間的複雜情緒，她無法克制異性對她的吸引與誘惑，渴望大膽放肆的戀愛，但在冷靜反省自己的感情時，又深深感到自己的貪婪與殘酷。在這些篇章中，「愛情」成為「人生」的代名詞，透過愛情的苦惱展演人生的困頓。此外，〈自殺日記〉中伊薩生活的窮苦困厄和精神的荒蕪空洞、〈日〉中伊賽日復一日、百無聊賴的生命狀態，甚而包括〈暑假中〉、〈小火輪上〉的女性知識份子因工作的挫折而產生的漂泊無依之感，都與「莎菲」的心情一脈相承。而這心情也未嘗不是現實中的中國新式女性知識份子面對未來的人生道路徬徨困惑的心情寫

²⁹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第三卷，頁48。

照。中國如丁玲這樣勇敢而個性鮮明的女性知識份子在經過五四與傳統家庭、包辦婚姻劇烈地鬥爭之後，看似獲得了自由與個人主體性，得以接受教育，並且期許自己參與社會，然而前景卻未必如此光明。當丁玲在二〇年代初從湖南長沙輾轉到南京、上海求學，又來到北京開始嘗試創作之時，她其實尚在摸索自己在社會上立足的方法，尚在找尋屬於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標，未來對她而言，充滿了不確定性²⁹。她筆下的莎菲們自憐自怨終至自暴自棄的精神狀態，以及其他篇章中無聊、寂寞、頹廢、虛無的心緒，可以說都是二〇年代猶在尋找人生目標的丁玲的心情，也是許多仍在人生道路上徬徨迷惘的中國新知識女性共同的心情，她們企圖在魯迅斷言「娜拉走後」的兩條死路中殺出一條生路³⁰，但此時她們的前景尚且十分黯淡，需要更堅強的勇氣和更堅定的意志力。

「莎菲」系列小說突顯了丁玲在兩個方面的特殊性。其一，在對於愛情的描寫方面，丁玲這部作品雖然寫在二〇年代末期這個革命浪潮淹沒個性解放之聲的年代，但小說的基本精神卻是五四的。「愛情」這個詞語在五四時期與在二〇年代末期以後、革命思想盛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意涵。在五四時期，「愛情」和自由、個性解放、反封建等概念結合成一組具有互文意義的詞語，丁玲早期的小說承繼五四精神，以愛情來象徵個性解放的精神，但更深刻地思考其中的問題，拿五四時期也描寫愛情的馮沅君和丁玲比較，馬上可以區分丁玲和五四前輩女作家的差異。對馮沅君來說，張揚愛情的崇高是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反叛封建觀念的策略，她和愛人是同盟戰友，馮沅君從

²⁹ 1924年夏天丁玲到北京，之後曾想過讀書或工作幾條不同的人生道路，包括投考大學、學習美術、學習法文到法國留學、做私人秘書、做家庭教師等。在苦悶中曾寫信給魯迅，渴望得到指引，後來又曾因看洪深的電影並聽了他的演講而興起當電影演員的念頭，終因無法接受電影界的現實而放棄這條路，最後終於在1927年開始寫小說。參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頁25-38。並可參見丁玲的散文〈魯迅先生于我〉，《丁玲全集》第六卷，頁105-121。

³⁰ 魯迅曾於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認為娜拉在覺醒之後，離家追求自由，但若沒有「經濟」作為後盾，她便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全集》第一卷，頁158-170。

來不描寫女主人公和愛人之間的矛盾或衝突，因為愛情是她反抗傳統所依恃的精神堡壘^③。她看似描寫愛情，實則在寫反叛傳統的故事。丁玲則在反叛傳統之後，進一步追問馮沅君逃避或無暇處理的問題，她更強調在愛情中認識性別之間種種的差異，透過愛情的苦惱更深刻地分析自己、認識自己，更徹底地追求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反叛傳統的道路上，馮沅君筆下的女主人公有她的愛人作為戰友，但在愛情的過程中，丁玲認為女人只有自己，而沒有任何依靠。同時，丁玲更進一步大膽而坦率地挖掘女性內心真實的「欲望」，包括對性、對肉體的欲望、想要操控種種感情的欲望、追求生命意義的欲望、對自我成就和自我定位的欲望，以及欲望像個深淵，無論如何也無法獲得滿足的失落感等問題。從這個方面來看，丁玲的個人主義是比五四女作家更為極端，也更為深刻的，她把每一個人（特別是自己）當作一個完全獨立的個人來分析，而且最關注內心精神的真實感受。她雖然透過女主人公的人際關係來呈現人物的困境，但問題本身往往不在外部，而在女主人公自身。丁玲藉由莎菲們的故事抒發個人追尋生命意義和出口的心路歷程，使得丁玲早期的小說風格近似於五四時期的郁達夫。她的虛無頹廢如郁達夫，困頓挫敗如郁達夫，但她面對個人問題時的坦率直視、毫不躲避也如郁達夫。從丁玲對郁達夫的繼承又可以發現女性解放的艱難之處：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包括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等人對女性自身內在心靈與欲望的挖掘都無法達到男性作家如郁達夫的深度，而這個工作，直到二〇年代末才由丁玲完成。

其二，當丁玲將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並建立起女性的主體意識，包括心靈的與身體的感覺和欲望之時，她也比五四前輩女作家更在意、也更強調女性個人生命的目標和個人在社會中的定位與價值。如同五四男作家追尋自己的人生理想，丁玲也以同樣的標準來看待女性未來的道路。這樣的觀點也使她與前輩女作家區分開來，丁玲固然向內深入挖掘女性的心靈狀態，但她也更強調女性與外在社會的連結關係，在五四女作家的筆下，社會問題總是空泛地歸結為封建家庭的束縛、社會的黑暗等抽象的觀念，而所謂「社會的黑暗」並無具體的面貌，但丁玲不同，丁玲強調女性個人在

③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9月15日）第一部分第三章對馮沅君小說描寫愛情的特質有很精到的分析，頁103-117。

社會的位置，她對社會問題也有更具體的認識，這在以下將討論的〈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可以看到。而在三〇年代後，她筆下的女性個人也將更積極地進入社會。從這兩個特點可以發現，丁玲在強調個性解放、個人獨立的主體性以及社會性兩個方面，都比她的前輩女作家有更開闊更深入的發展。

「莎菲」系列小說之外，由〈夢珂〉所開展出來的另一個主要議題是女性處境與社會現代化、資本主義商品化之間的問題，代表作品是〈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阿毛原是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山村姑娘，她離開自己貧窮荒僻的娘家嫁到西湖邊上的富裕農家後，就展開她對城市的冒險之旅。從鄰居三姐的口中，她開始想像美好的城市，她在夜晚望著西湖邊上杭州城的萬家燈火，想像那是繁星一般的鑽石寶帶。她被三姐帶領著遊逛了讓她目眩神迷的杭州城，又因富貴人家來西湖遊玩而逐漸見識到城裡人的享受，她對城市的繁華認識得越多，她的虛榮和欲望越增加，她的苦惱也越多，渴望享福的心使她對金錢產生無窮的野心。她努力勤奮地養蠶、工作，幻想自己將來能擁有富貴和幸福，但是當她領悟到光靠著他的丈夫陸小二種田是無法讓自己享受富貴生活時，她便不再工作，一心只想著作一個城市裡的摩登女人，她相信女人的命運全繫於男人身上，她開始懊悔自己的婚姻，期待到西湖來玩的有錢男人看上她。後來她想到城市裡當畫家的模特兒，遭到丈夫和婆家的處罰，灰心喪氣之餘，又知道隔壁的漂亮姑娘即使有錢也逃不過死神的安排，她開始發現她所謂的幸福全是虛幻的空想，精神上的苦悶使她鬱鬱寡歡，感到人生無味，最後走上自殺一途。〈阿毛姑娘〉描寫來自鄉村的女主人公對於城市及現代文明的啓蒙之路，但這啓蒙卻意味著墮落。〈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也表現類似的主題，小說中的阿英從鄉下到上海當妓女，她真正欣賞、喜歡的男人是在鄉下種田的、老實粗壯的陳老三，她夢見自己回到家鄉，和陳老三安安靜靜地生活。但是從夢中醒來，現實中的陳老三靠種田養不起一個老婆，更不用說來替她贖身。而阿英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過慣了現在這種有錢的享樂生活，她再也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過去了：

早上的夢，她全忘了。那於她無益。她為什麼定要嫁人呢？吃飯穿衣，她現在並不愁什麼，一切都由阿姆負擔了。說缺少一個丈夫，然而她夜夜並不虛過啊！

而且這只有更能覺得有趣的……她什麼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男人睡，但這事並不難，她很慣於這個了。她不會害羞，當她陪著笑臉去拉每位不認識的人時。她現在是顛倒怕過她從前曾有過，又曾渴望過的一個安分的婦人的生活。³²

〈阿毛姑娘〉等兩篇小說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系列小說的補充，它的女主人公並不是新式女性知識份子，而是來到鄉鎮城市的農村姑娘，這兩篇小說與「莎菲」系列合觀，可以看到丁玲在二〇年代末期對當時女性艱難命運的思考，女性才剛剛擺脫封建家庭及傳統觀念的束縛，又得立刻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繁華」、「享樂」的城市生活對女性的誘惑和控制，而這正呼應魯迅「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結論。莎菲等新式女性知識份子努力在兩者之間殺出重圍，追求女性真正的獨立自主，但卻在現代社會中漂泊、徬徨、進退失據，找不到出路，因此對人生感到苦悶與虛無。阿毛、阿英等來自鄉村、未受過教育的純樸的女性，在無所依傍下進入城市，只有走上出賣身體賺取金錢的墮落之途。女性處境在此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糾結在一起，從阿毛、阿英兩位女主人公的命運，初步展現丁玲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思考。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文明為城市妝點了繁華和進步的炫麗外貌，卻也將女性物化得更為嚴重；女性被都市文明和享受所誘惑和吸引，為了比較快速地滿足虛榮和欲望，只有將自己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阿毛等人的命運回應了「夢珂」進入劇院當演員後的遭遇，正如論者所言：

夢珂的故事象徵了走入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運：從鄉村到都市，從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個解放過程，而是一個從封建奴役走向資本主義式性別奴役的過程，也是女性從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賣為色情商品的過程。

³³

³² 丁玲：〈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丁玲全集》第三卷，頁196。

³³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頁180。

夢珂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知識份子，離家之後爲了生存，尚且無法逃脫現代社會觀看女性，將女性物化的圈套，何況是阿英等身無長物的農村姑娘。在丁玲筆下，女性進入城市，未受教育的阿英直接成爲妓女，受過教育的夢珂忍受著男人的眼光和評論，成爲上海的女明星，不願意屈服於現代化社會的遊戲規則，就註定成爲漂泊徬徨的莎菲。

丁玲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在 1929 年出現轉折。寫作於 1929 年至 1930 年的〈野草〉、〈年前的一天〉兩篇小說³⁴，說明丁玲逐漸擺脫「莎菲時期」的人生困境。〈野草〉中的女主人公早年也沉湎在愛情刺激的追求中，但現在她面對著南俠的追求卻毫不動心，因爲她的心專注於她的小說創作中。〈年前的一日〉以丁玲自己和胡也頻的生活爲藍本，描寫女主人公和她的文學同志沉浸在文學世界中，過著賣文爲生，貧窮但充實、寧靜的生活。爲了過年，兩人不得不預支稿費，雖然背負著沉重的欠債，但他們面對人生卻懷抱著「健全的勇猛的生活的力」，對坐著吃橘子、寫文章，將「一切生活的黑影」和「陰沉沉下著細雨的天氣」一起拋在窗外³⁵。這兩篇小說和「莎菲」系列小說最大的差異在於女主人公擺脫了愛情的追逐和糾纏，找到自己以「寫作」爲重心的生活方式，並且對自己的存在方式感到滿足和愉快，不再有〈暑假中〉、〈小火輪上〉等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工作上的徬徨感、無力感和挫敗感。因此小說的整體氣氛和情緒一掃「莎菲」系列的頹喪和虛無，顯得和緩、舒展，甚至不乏昂揚的精神。這意味著丁玲及其筆下的「莎菲」們幾年來在社會上的衝撞和努力，此時終於有了初步的結果，她們在「墮落」和「回來」外找到「寫作」這一條「暫時」讓自己滿意的安身立命之路，即使往後的人生道路仍是艱辛而漫長。

³⁴ 在《丁玲全集》中，這兩篇小說並未註明寫作時間，但根據王增如、李向東所編的《丁玲年譜長編》，〈野草〉寫作於 1929 年 5 月，〈年前的一天〉刊登於 1930 年 6 月的《小說月報》。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頁 49、56。

³⁵ 丁玲：〈年前的一天〉，《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256-265。

四、文學道路的轉折

——胡也頻與丁玲二〇年代末期的「革命＋戀愛」小說

1928年二月，丁玲和胡也頻從北京到上海，同年三月至七月曾到杭州短暫居住，之後又回到上海。在上海這個資訊發達，各種文學、社會活動蓬勃活躍的大城市，丁玲和胡也頻逐漸受到共產黨革命以及「革命文學」的影響，1929年至1930年是丁玲和胡也頻的文學活動出現轉折的年代。從北京到上海後，胡也頻開始閱讀魯迅和馮雪峰翻譯的蘇聯文藝理論，進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及社會科學的書籍，迅速左傾，並開始提倡普羅文學。1929年發表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1930年發表《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等左翼革命小說，這兩部小說都包含了「革命」與「戀愛」兩個元素。而丁玲則在這個時期寫出了〈野草〉和〈年前的一天〉，逐漸擺脫「莎菲時期」的苦悶，於此同時，她寫出中篇小說《韋護》及短篇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這三篇作品也被認為是「革命＋戀愛」重要的代表作。

最早對「革命＋戀愛」小說進行較完整地分析和討論的是作家茅盾，他在1935年發表〈「革命」與「戀愛」的公式〉一文，歸納出「革命＋戀愛」的三種模式，一是戀愛妨礙了革命，因此為了革命而犧牲戀愛；二是革命與戀愛相因相成，革命決定了戀愛；三是在革命的過程中成熟了戀愛，因此革命產生了戀愛。³⁶賀桂梅在〈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³⁷中則將「革命＋戀愛」小說蓋括地分為「蔣光慈模式」和「丁玲模式」兩種。前者是革命與戀愛的兼容，革命決定或產生了戀愛，這個系統的小說代表戀愛與革命兩種生命欲望的轉換，戀愛驅動了對革命的追求，或者革命彌補了戀愛的挫敗。後者則表現為革命與戀愛的衝突，

³⁶ 茅盾：〈「革命」與「戀愛」的公式〉，《茅盾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337-352。

³⁷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5月，頁69-92。

呈現「五四時期和革命文學時期兩種現代性話語之間的衝突，同時也可以視為一種清算戀愛話語的方式」³⁸，通過描寫戀愛極致的幸福和完滿來「揚棄」愛情，轉而追求革命。賀桂梅雖以「蔣光慈模式」和「丁玲模式」來分析「革命＋戀愛」小說的兩種模式，但個人認為若以「胡也頻模式」來替代「蔣光慈模式」，依然可以說明這類小說的兩種模式，雖然胡也頻的作品風格與蔣光慈大為不同，胡也頻較為光明昂揚，蔣光慈較為愁怨曲折，但兩人都著重在革命與戀愛的兼容，與丁玲偏重革命與戀愛的衝突有著明顯的差異。而胡也頻與丁玲「革命＋戀愛」小說的差異與他們兩人在二〇年代末期至三〇年代初期對於革命態度的差異有關。

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和〈胡也頻〉兩篇文章中曾敘述胡也頻左傾的過程，並在描述胡也頻性格的同時說明他對革命的態度：

也頻有一點基本上與沈從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個愛幻想的人，他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不像沈從文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也頻卻是一個堅定的人。他還不了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了解那些他從來也沒聽到過的理論。³⁹

也頻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他了解了革命真理的時候，他是不會躊躇退縮的。因為他不是一個私心很重的人，動輒要權衡個人得失。他日常不愛多說話，不善談諧，不會諷刺，他討厭用玩世不恭來表現自己的聰明，但他卻是扎實的，堅強的，穩重可靠的。⁴⁰

這些文字既生動地描繪出胡也頻鮮明的性格，也展現出胡也頻面對革命時義無反顧的堅定態度，因為對胡也頻來說，「革命」是他在艱辛的人生道路上跋涉的過程中找到

³⁸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頁 80-81。

³⁹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九卷，頁 68。

⁴⁰ 丁玲：〈胡也頻〉，《丁玲全集》第六卷，頁 96-97。

的一條可能的出路，當他投注全部的心力在同情下層階級的苦難時，「革命」又為他找到改變社會現狀的可能辦法。因此當他受到革命的吸引，並開始接觸相關的理論書籍後，他便毫不猶豫地展開他的革命實踐。1929年夏天，胡也頻因出刊《紅黑》月刊積欠一大筆債務，不得不將雜誌停刊，另謀經濟來源。1930年初，胡也頻與董每戡一起前往濟南山東省立高中教書。在濟南教書的幾個月間，胡也頻便在學生群中宣揚他剛剛學習的革命理論，包括唯物史觀、社會科學理論與普羅文學理論等，因此在同年五月時便被山東省當局注意，不得不結束短暫的教書時光，回到上海。^④

也因為胡也頻對於革命態度的積極與堅定，他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都著重在知識份子面對光明的革命前景時，充滿信心與嚮往的心情。寫作於1929年的《到莫斯科去》描寫女主人公素裳女士受到革命者施洵白的吸引和影響，決定拋棄富貴少奶奶的生活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素裳女士是個美麗、聰明、情感熱烈而細膩，富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養，又充滿生命活力的個性獨特的女人，然而她卻嫁給一心追求政治權力、庸俗的黨國要人徐大齊，過著富貴但貧乏無味的生活。她的熱情與生命力使她對目下的生活感到厭倦和無聊，她期待自己能獨立做些有意義的工作。就在此時，她認識了施洵白。施洵白年少時飽受欺凌的學徒經驗讓素裳感到心驚和同情，也讓她認識到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施洵白的智慧和思想、沈靜與毅力使素裳傾心，更讓她對現有的生活感到不耐。她在施洵白的影響下放棄了原本對於文學的傾心，開始閱讀唯物主義思想的書籍，逐漸形成她的階級意識。正當素裳決定和施洵白一起奔向新的生活時，徐大齊利用政治權力秘密地將施洵白逮捕並處決。然而即使面對這樣的噩耗，素裳仍堅定地設法到革命聖地「莫斯科」去學習。

寫於1930年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不論在內容、結構和邏輯上都和《到莫斯科去》非常相似。整部小說以1925年的「五卅慘案」為核心，擴及「五卅慘案」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和全國總罷工等反帝運動的高潮時期，描寫女主人公白華從無政府主義支持者轉向共產主義革命者的過程。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劉希堅和白華是一對互有

④ 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頁88-91。

好感的青年男女，他們從前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然而在一年前，劉希堅開始感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空洞性和幻想性，因此轉向共產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性能具體落實在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因為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是根據中國社會具體客觀的現狀來決定革命路線。劉希堅在轉向共產主義的同時，也希望白華在思想上能與他步調一致，然而白華卻仍堅持無政府主義的信仰。但在面對「五卅慘案」的事件上，兩個組織陣營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劉希堅的陣營連夜開會，整個組織動員起來，分頭發放傳單、起草抗議宣言、舉行街頭演講、參與罷工示威，而白華的陣營卻對此事毫不關心，仍在設想烏托邦式的新村的建立。這樣巨大的落差讓白華感到沮喪和憤怒，她在孤軍奮鬥中不得不承認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性和脫現實性，她在理想的幻滅與失望中閱讀了許多共產主義的書籍，終於走上了劉希堅的革命道路，在劉希堅的引領下加入了共產黨的組織。小說的最後結局是戀愛與革命的雙重勝利。

在這兩部小說中可以看到幾個相似的特點：首先，在小說結構上，兩部小說都是描寫女主人公受到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的啓蒙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其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都有「簡單化」的傾向，人物塑造鮮明而對立，其中的革命者既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刻的思想，又有實踐的行動力，沈穩而有毅力。革命者對立面的人物則像《到莫斯科去》中的徐大齊是個濫用權力，庸俗而殘忍的政客，或像《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中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者「自由人無我」只醉心於新村的建設，對於帝國主義對工人運動的鎮壓麻木無覺，甚至惡意地認為鎮壓和屠殺是共產黨造的謠，為的是製造群眾的恐怖。第三，小說的主題都描寫革命與戀愛的關係，且較著重在革命與戀愛的一致，但兩部小說的表現方式略有不同。《到莫斯科去》中素裳女士對施洵白萌生的愛情促使她更順利地走上革命之路，但當她的革命之路剛要展開時，施洵白就遇害犧牲了，然而施洵白的犧牲卻讓素裳更堅定地走向革命。素裳的愛情成功地轉換為革命的動力，而堅持革命也是素裳對施洵白愛情的證明，即使施洵白已經犧牲了。《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則描寫戀愛與革命從矛盾到統一的過程，小說中的劉希堅與白華最初因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造成情感上的隔閡，但終因白華走向革命而讓兩人的戀愛與革命趨於統一。而在戀愛與革命的兩種元素中，胡也頻更看重革命的元素，革命決定了愛情的可能性。第四，兩部小說都充滿了慷慨的熱情和昂揚的鬥志，小說結尾都迎向充滿希望的美好

前景，在寫法上也非常近似，《到莫斯科去》的結尾是：

於是這火車向曠野猛進著，從愁慘的，黯淡的深夜中，吐出了一線曙光，那燦爛的，使全地球輝煌的，照耀一切的太陽施展出來了。⁴²

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的結尾則是：

他們兩個人便動步了，向著燦爛的陽光裡走去。一種偉大的無邊際的光明展開在在他們的前面。⁴³

「太陽」是這兩篇小說中表現光明的共同意象。

雖然兩部小說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從《到莫斯科去》到《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依然有其進展的線索。首先，雖然兩部小說都描寫革命與戀愛的關係，但在《到莫斯科去》中，革命與戀愛的關係較為單純，僅僅是戀愛與革命的轉換，然而在《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中，當白華尚未走上革命之路時，作者對劉希堅內心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矛盾著墨較為細膩，細膩的內心描寫有助於人物形象的深化與複雜化。其次，《到莫斯科去》較著墨於浪漫愛情的描寫，楊義認為這部小說是「充滿浪漫主義熱情的革命傳奇」⁴⁴，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放下了浪漫愛情的描寫，一方面著墨於主人公內心的衝突：劉希堅內心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白華內心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信仰的衝突，另一方面也強調革命的理念和實踐，他透過對共產黨員的組織工作和街頭運動的描寫來展現革命的實踐性，也透過普通老百姓抵制英日貨的行動來展現群眾素樸的愛國心和最初的覺醒。從這兩個角度可以看到胡也頻從《到莫斯科去》到《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的進步。

⁴² 胡也頻：《到莫斯科去》，《胡也頻選集》（下冊），頁 767。

⁴³ 胡也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胡也頻選集》（下冊），頁 900。

⁴⁴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 10 月），頁 283。

相較於胡也頻小說中對於革命抱持著堅定昂揚的精神，並強調革命與戀愛的兼容，丁玲的小說《韋護》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則是「漸進式」地在五四個人主義的精神中加入了二〇年代末期社會和文壇盛行的革命元素，在這漸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丁玲對外在世界的變化最真誠的觀察和思考。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完成於1929年五月初，同年冬天，丁玲完成了《韋護》。這部作品取材自丁玲好友王劍虹與共產黨員瞿秋白之間的戀愛故事。主人公韋護年少時具有浪漫、感傷，對人生的一切感到空虛和懷疑的詩人氣質，後來經歷馬克思、列寧著作的洗禮，鍛鍊了意志，也堅定了信仰，回到國內從事革命工作。但是這兩重性格總是相互拉扯著，他喜歡並習慣安靜舒服、適合寫作的生活，良心卻敦促他去適應革命者的受苦耐勞，最終還是前者戰勝後者。他在忙碌的教書、翻譯生活中，仍鍾情於寫些讓他珍愛的小詩，也沉醉於不朽的文學巨著。當他開始喜歡上麗嘉時，他就感受到戀愛與革命之間的隔閡，他已經獻身給他的革命理想，不可能回到從前是個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是個詩人和音樂家的年代，然而麗嘉欣賞和喜愛的，卻偏偏是後者。當韋護與麗嘉陷入熱戀之後，韋護完全荒廢了他的工作，他和麗嘉整日地窩在舒適的小屋中談情說愛，讀詩論文學，嘗到愛情的幸福與美好。愛情的美好到達極致時，同志的不滿卻加深了韋護心中的矛盾和痛苦，他感到自己不論對於愛情或信仰都是不忠實的，經過內心激烈地鬥爭後，他選擇到廣州參加革命，拋棄了麗嘉。小說講述的既是革命與戀愛之間的衝突，也是五四個人主義精神的張揚與二〇年代末期後革命所講究的政治性和集體性之間的衝突。小說最意味深長之處在於，從表面上看來，最終是革命戰勝了戀愛，堅強的理智戰勝了情感，但整部小說呈現出來最迷人的部份卻是韋護在與麗嘉戀愛時所感到精神上的滿足感和豐潤感，而為了革命理想，韋護不得不割捨讓他的靈魂感到幸福和富足的愛情。在小說中，麗嘉對韋護的工作表示理解和寬容，但韋護的同志卻對他的戀愛表達批判和不滿，似乎戀愛可以包容革命，但革命卻容不下戀愛。從小說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丁玲敏銳地感受到社會的革命氛圍，但她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模式仍是五四個人主義的精神。對她而言，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她更享受〈年前的一天〉裡所描寫的追求文學的道路。

在《韋護》之後，丁玲在1930年六月至十月間寫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

一、之二)⁴⁵，這兩個中篇在寫作時間上略晚於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⁴⁶。丁玲曾說這兩篇小說是她參加「左聯」之後給讀者的獻禮，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兩篇小說合觀，可以看到丁玲對「革命」與「戀愛」有更進一步、更全面的思考。〈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女主人公美琳原本與作家子彬過著相當舒適、享受的生活，但在子彬與革命運動者若泉對於文學的爭執和辯論中，美琳開始對幸福的家庭生活感到空虛，也逐漸對社會現狀、階級革命有所認識，最終選擇拋棄子彬，在五一勞動節走上遊行的行列。小說從子彬和美琳關係的改變說明革命和戀愛的衝突，但這衝突也在子彬和美琳的心中，子彬面對的是原有的名聲、生活、思想與進步的文藝團體之間的選擇，美琳則面對子彬的愛情與積極開展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選擇。如果說子彬和美琳代表的是時代變化中尚在面對人生道路的抉擇的知識份子，更進一步的則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小說中的革命者望微與女朋友瑪麗兩人各自都已確立了人生信仰。面對完全不同的人生信仰，望微努力想調解、彌平革命運動與愛情之間的衝突和隔閡，但結果卻讓他筋疲力盡；瑪麗對望微的革命工作感到呆笨和乏味，她追求愛情的完整和忠實，無法忍受望微的「分心」。最終瑪麗選擇離開望微，追求自己的幸福，望微也坦誠「信仰是永遠不會磨滅的」，小說的最後，兩人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當望微在大街上演講、示威時，他看到瑪麗衣著光鮮，歡樂地提著逛街的「戰利品」，身邊是一個漂亮的青年。

這兩篇小說中不論是子彬或美琳，望微或瑪麗，其實都正面對著五四時期與革命時代兩種意識型態和思想觀念的抉擇，而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子彬靠著充滿個人主義和感傷主義的作品贏得少年讀者的愛戴，他滿足於這樣的生活，不願捲入革命的

⁴⁵ 1931年5月丁玲出版了自己與胡也頻的作品集《一個人的誕生》，以紀念胡也頻的犧牲。在這本作品集中，收錄了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這兩部小說。她在自序中說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原本計畫寫成一個長篇，但因懷孕身體不適，故改成五個相互連貫的短篇。寫了兩篇之後，便因身體不堪負荷而中斷，接踵而來的是胡也頻遇害的噩運，以至沒有完成最初的計劃。見丁玲：〈《一個人的誕生》自序〉，《丁玲全集》第九卷，頁8-9。

⁴⁶ 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寫作於1930年三月至九月間，見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頁96。

聲浪中。美琳則在社會革命運動的衝擊下，無法再安於五四之後所擁有幸福的婚姻生活，而希望通過社會運動找到証明自己的方法，於是投入革命。望微有堅定的革命信仰，但他企圖找尋革命與戀愛間的和諧共處之道，終告失敗。瑪麗則厭棄望微的革命信仰，追求「戀愛至上」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小說都是由女主人公主動作出明快的人生抉擇，拋棄愛人，一個追隨革命，一個追求理想中的愛情，與《韋護》由男主人公作出決定、女性處於被動狀態大異其趣，這使得這兩篇小說延續丁玲之前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丁玲對自己，也是對女性人生道路的持續思考，女性在經歷五四運動的鬥爭後，擁有了自己選擇的愛情，也展開艱辛寂寞但獨立自主的文學之路，如今遇上了讓所有關心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都不能不正視的革命浪潮，女性應該怎麼選擇？是前進還是退守？雖然兩篇小說女主人公的選擇完全不同，但從內容來看，隱約可見丁玲從五四個人主義到社會革命的跨越。在〈之一〉中，丁玲從正面描寫美琳積極地進入社會，在〈之二〉中，丁玲雖然仍讓瑪麗選擇追求自己的愛情和幸福，但丁玲卻又藉瑪麗之口說出她對愛人的不滿，而這不滿，卻又意謂著愛情無法操之在我的非自主性和難以避免的缺憾：

「我使你痛苦嗎？笑話！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麼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許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來，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允許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麼都沒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無聊！是寂寞！是失去了愛情後的悔恨！然而我忍受著，陪著你，為你的疲倦後的消遣。我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現在，哼，你倒嘆氣了，還來怨我……」⁴⁷

瑪麗對望微的怒吼未嘗不是顯示：她將人生美好的希望和目的寄託在愛情上，所得到的結果只是寂寞和痛苦。瑪麗堅持繼續追尋她的愛情和幸福，但她能保證不會再次嘗

⁴⁷ 丁玲：〈一九三〇春上海（之二）〉，《丁玲全集》第三卷，頁327-328。

到「失去了愛情後的悔恨」？如果愛情充滿了「非自主性」，那麼參與革命會不會反而是具有自主性的選擇？

丁玲寫作〈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時，正是胡也頻積極於「左聯」工作之時，丁玲在 1950 年的回憶文章中曾說：

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裡寫我的小說《一九三〇春上海》。⁴⁹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也頻走上革命的過程較為順利而迅速，面對革命的態度也非常積極和堅定，因此他這個時期的作品充滿了光明和昂揚的氣氛，也傾向於呈現革命與戀愛的兼容和一致，而丁玲走向革命的過程則更為曲折。在丁玲與胡也頻對革命的步調不一致的情況下，丁玲未嘗不曾有被拋下的寂寞和痛苦，這也許刺激向來強調女性要獨立自主，並執著於追尋女性社會定位與價值的丁玲對女性參與社會革命產生新的思考，她在社會革命運動中看到女性參與社會的另一條可能的出路。但這選擇並非沒有疑慮，她深怕選擇革命將喪失女性經歷辛苦鬥爭才得以擁有的獨立自我。對當時的丁玲來說，無論抉擇為何，五四個人主義精神與革命的政治性和集體性二者之間基本上是難以相容的，正如小說中的革命和戀愛是難以相容的。

五、結語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下，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受到啟蒙而成爲具有現代眼光的知識份子。由於傳統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束縛和規範遠比男性更多，因此女性的啟蒙道路要比男性更為曲折。這個因素影響了胡也頻和丁玲二〇年代中期的創作內涵。儘管胡也頻此時也對未知的前途充滿焦慮，在貧窮的困頓中掙扎著，但他堅信自己擁

⁴⁹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九卷，頁 70-71。

有關懷社會和參與社會的權利。他從飽受欺凌的學徒生涯中走來，經歷了貧窮而漂泊的歲月，也對社會的種種不平感到痛苦與憤怒，這使得胡也頻的創作在描寫漂泊的知識份子的苦悶心理之外，更向廣大的社會底層展開，從書寫下層群眾的貧窮處境出發，進而思考並批判造成苦難的種種社會因素，又從反封建的意識出發，進而書寫麻木冷漠的國民性。胡也頻二〇年代中期的作品繼承了「文學研究會」的社會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對種種社會現象和問題進行廣泛性的觀察、挖掘、反省和批判。

當胡也頻向外描寫社會現象時，丁玲更著重在向內書寫生命的困境與苦悶。如果說胡也頻的作品是向社會的廣度發展，丁玲的作品則是向靈魂的深處探掘，因此丁玲的作品更接近「創造社」書寫自我的文學傳統。丁玲的人生困境主要來自於她不知道在這個男性的社會裡，女性將置身何處。啓蒙讓女性擺脫家庭的束縛，但卻沒有告訴她們該往何處去？在沒有經濟基礎的情況下，擺脫家庭束縛的女性依然不具有獨立的自我，這是沒有經濟權的娜拉走後的悲哀。丁玲從 1927 年開始寫作，她的作品全部聚焦在女性的「愛情」和「工作」上，「愛情」是五四個性解放的代名詞之一，而「工作」則代表娜拉走出家庭之後的人生道路，這是女性追尋獨立自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兩個議題。

1928 年胡也頻與丁玲來到上海後，開始受到左翼革命思潮的洗禮。二〇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描寫各種社會問題，而且對於社會現狀感到憤怒的胡也頻很快地找到了改造社會的方法——「革命」，他的作品從早期抑鬱而低沈的怒吼，轉為昂揚而振奮的歌唱，這是他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他筆下的青年男女同赴革命之路，既是同志，又是伴侶，革命與戀愛相輔相成。而好不容易在寫作中找到獨立自我的丁玲面對革命卻充滿疑慮，對她來說，戀愛與革命，就如同五四啓蒙與二〇年代末期開展的革命，也如同五四所強調的個人解放的精神與革命所強調的集體性和政治性，在思想上具有某些本質性的差異，而這差異又具有難以轉化的矛盾和衝突。在啓蒙與革命之間，丁玲猶疑而難以選擇。

1931 年二月，胡也頻遇害，悲憤與痛苦促使丁玲很快地選擇了革命，走上胡也頻生前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她將繼續完成胡也頻所未能走完的漫長、曲折而艱辛的革命之路。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 丁玲，《丁玲全集》（全十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 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9月15日。
- 胡也頻，《胡也頻選集》（上、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 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 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 張永泉，《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3月。
- 黃昌勇，《磚瓦的碎影》，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
-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5月，頁69-92。
-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10月。
-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 On the Novels of Hu Yepin and Ding Ling from the 1920s to Early 1930s

Su, Min-y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Hu Yeping (1903-1931) came to Beijing in the 1920s and soon came Ding Ning (1904-1986). They got acquainted in 1925, fell in love, and each began their literary career, while their literary development from the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completely matched with the historical pat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went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Both of their early works were affec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discovering man” from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but their interests were different. The novels of Hu Yeping directed toward the darkness of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which portrayed the difficult lives of people under the rampages of warlords and robbers, the national foolishness, numbness and backwardness due to spiritual enslavement of traditional feudal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drifting souls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May Fourth generation; the novels of Ding Ling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ersonal predicament of life of females, attempting to open a road of independence in the difficult lives of the “Noras” who were liberate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fter Hu Yeping and Ding Ling came to Shanghai in 1928,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thoughts of revolution and their works started to show a hint of “both revolution and romance.” However, the “*Heading to Moscow*” and “*Bright Future is Down the Road*” by Hu Yeping focused o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omance, while the “*Wei Hu*” and the essays of “*Shanghai in the Spring of 1930 (Part I and Part II)*” by Ding Ning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ten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omance. Through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the novels of Hu Yeping and Ding Ling, this research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iterary paths of the two that “began from enlightenment and turned to revolution,” and with these, this research also illustrate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wo writers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Hu Yeping, Ding Ling,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ce

